

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文化 生业与环境研究系列报告

五

浑河下游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报告

(下册)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 编著

曹建恩 主编
党 郁 孙金松 杨星宇 副主编

文物出版社

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系列报告·五

浑河下游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报告

(下册)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

曹建恩 主 编
党 郁 孙金松 杨星宇 副主编



第三章 结语

第一节 文化序列及内涵

自20世纪70年代始至21世纪初，历经数十年不同规模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内蒙古中南部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先秦两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由早及晚可分为官地一期、鲁家坡一期、庙子沟、阿善三期、永兴店、大口二期、朱开沟、西岔、西麻青、毛庆沟、汉代等11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而在浑河下游调查范围内，仅发现8个阶段的文化遗存。

第一段：以020、044号遗址为代表，属官地一期文化遗存，是内蒙古中南部南流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遗存，相当于后岗一期文化或半坡文化阶段。主要器类有饰绳纹、弦纹或二者皆饰的敛口罐、敛口瓮，饰弦纹或素面的窄沿盆，素面敞口或直口钵、红顶钵、折唇小口壶、矮领双耳壶和尖底罐等。

第二段：以001、002、003、253号遗址为代表，属鲁家坡一期遗存，相当于西阴文化阶段。典型器物有重环口尖底瓶、绳纹折沿罐、敛口瓮、盆、素面或口沿外饰黑彩带的微敛口或直口平底钵和火种炉等。

第三段：以030、140、182号遗址为代表，属庙子沟文化遗存，相当于西王村文化阶段。典型器形有小口双耳罐、侈口绳纹罐、直口筒形罐、喇叭口小口尖底瓶、直口或敞口折腹钵、敛口曲腹钵等，彩陶装饰多以三角形、圆圈纹、鳞纹、绞索纹、菱形纹、平行线纹等组成繁缛复杂的复合图案，内彩极为发达。

第四段：以010、019、001、002、021号遗址为代表，属阿善三期文化阶段，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盛行横篮纹，偶见彩陶。典型器类有篮纹鼓肩或折肩罐、高领罐、小口壶、折腹盆、斜腹盆、敛口曲腹钵、豆，并有器颈部或口沿外箍多周附加堆纹的直壁缸、大口瓮、敛口瓮。依据采集品的差异，本阶段又可细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以010、019号遗址为代表，以饰有彩带或素面的曲腹钵、小口双耳篮纹罐、敛口篮纹瓮、折腹钵等为组合，其中折腹钵折腹处存有一道凹槽、篮纹尖底瓶底部成为小乳突等特征较为典型；而阿善三期文化晚段典型遗址如001、002、021等，出土丰富的窄

沿罐、高领篮纹罐、素面豆、盆等器物，而折腹钵处的凹槽演变成成为折棱，尖底瓶底部的小乳突演变成平底等特征也是晚段的重要特征。

第五段：以064、278、279、351号遗址为代表，属永兴店文化遗存，典型器类有双罄鬲、高领罐、双耳罐、斝、单罄鬲等。064号遗址的鬲裆呈M形、袋足略瘦，应属于此一阶段年代较早的遗存，而278、279、351号遗址的鬲为尖裆、袋足肥胖，属此一阶段晚期遗存的典型器物。

第六段：以140、223号遗址为代表，属朱开沟文化遗存，相当于商代早期阶段。流行厚背弯身的石刀，典型陶器有花边鬲、蛇纹鬲、三足瓮、盆形甗、小陶杯等。

第七段：以001、041、101、126、148号遗址或墓地为代表，相当于毛庆沟文化阶段，主要的流行年代为战国时期。此一阶段的文化内涵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三类遗存：001、041、101号遗址属于典型的战国时期中原文化遗存；126号遗址经试掘，发现东西向的竖穴土洞墓，殉牲有马、牛、羊等动物头骨，随葬品以短剑、带扣、镞、扣、管、针筒和骨马镳、骨弓弭等为主，属典型的北方早期游牧文化遗存；以148号姑姑庵遗址和墓地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出土有月牙形銎手鬲、素面罐、箭镞等遗物，与126号遗址的文化内涵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第八段：以045号八龙湾遗址为代表，相当于汉代，典型器类有泥质灰陶盆、罐、瓮、瓦等。从采集的遗物来看，以中原文化因素为主，个别陶器上施有刻划的水波纹或水波状的细附加堆纹，应与匈奴遗存存在诸多联系。

与内蒙古中南部相比较，浑河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存在着明显的文化缺环。即相当于夏纪年的大口二期文化未见于调查范围内，其原因可能在于此类遗存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及陕北地区，未能跨越黄河天险到达南流黄河东岸；商代晚期至春秋初期在调查范围内亦存在文化空白的现象，这可能与西岔文化与西麻青一类遗存本身遗址数量稀少有关。此外，在第七段未能划分出春秋阶段以及在第八段未能划分西汉和东汉时期，皆因采集品过于破碎，缺乏可资比较的标准器。

第二节 聚落形态的分析

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它需要建立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之上，明确调查目标、覆盖面和强度。总体而言，调查的目标就是对资料的收集、观察和分辨；覆盖面指的是资料收集的空间范围，较大的、连续的空间范围方能反映聚落形态研究中的关联特征，如其垂直复合关系、水平复合关系、边界和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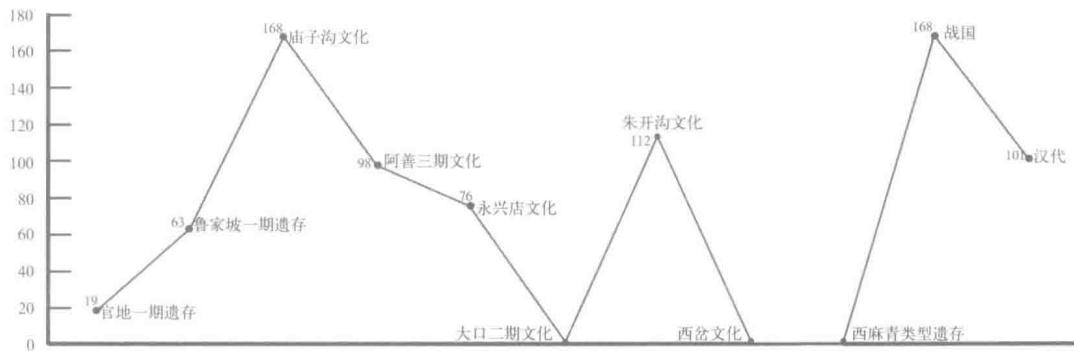
动等，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强度指的是单位覆盖区内观察的次数，也就是耗费的时间，这与研究者观察的时间、理论的运用相关。本次调查所做是在调查目标和覆盖面上的一次尝试，而在强度上还需要不断深入的进行。

一 遗址在时间分布上的变化

1. 遗址数量在时间上的分布及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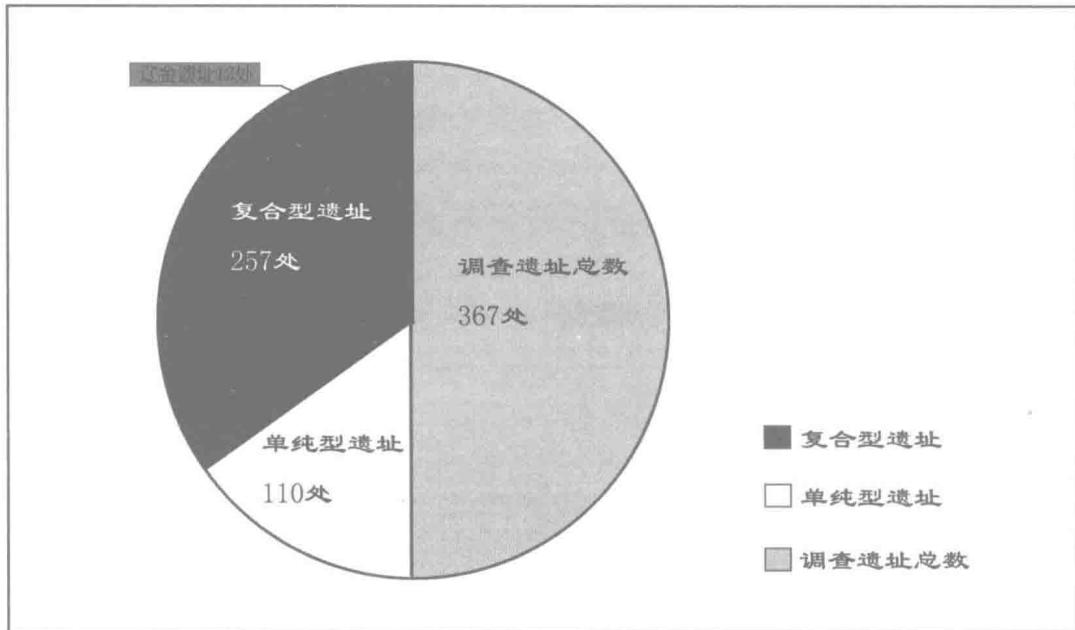
本次调查共发现各类遗址367处，其中官地一期遗存19处，占遗址总数的5.2%；鲁家坡一期遗存63处，占遗址总数的17.2%；庙子沟文化共168处，占遗址总数的45.8%；阿善三期文化遗址点共98处，占遗址总数的26.7%；永兴店文化遗址点共76处，占遗址总数的20.7%；朱开沟文化遗址点共112处，占遗址总数的30.5%；战国遗址点168处，占遗址总数的45.8%；汉代遗址点共101处，占遗址总数的27.5%（图一八四）。

从不同时间段内的遗址点数量变化图来看，官地一期—鲁家坡一期—庙子沟文化时期的遗址数量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各文化之间呈3~4倍的数量规模增长。而庙子沟文化之后，到阿善三期文化和永兴店文化的遗址点数量虽然没有呈直线下降趋势，但大



图一八四 不同时间内遗址点数量变化折线图

幅度减少的趋势也是很明显。永兴店文化—朱开沟文化时期遗址数量有所恢复，至商代晚期至春秋初期即西岔文化—西麻青遗存时期，遗址数量降至零点，至战国时期遗址数量猛增至庙子沟文化时期的水平，汉代又有所减少。



图一八五 遗址点类型数量分布图

2. 单个遗址在时代上的分布及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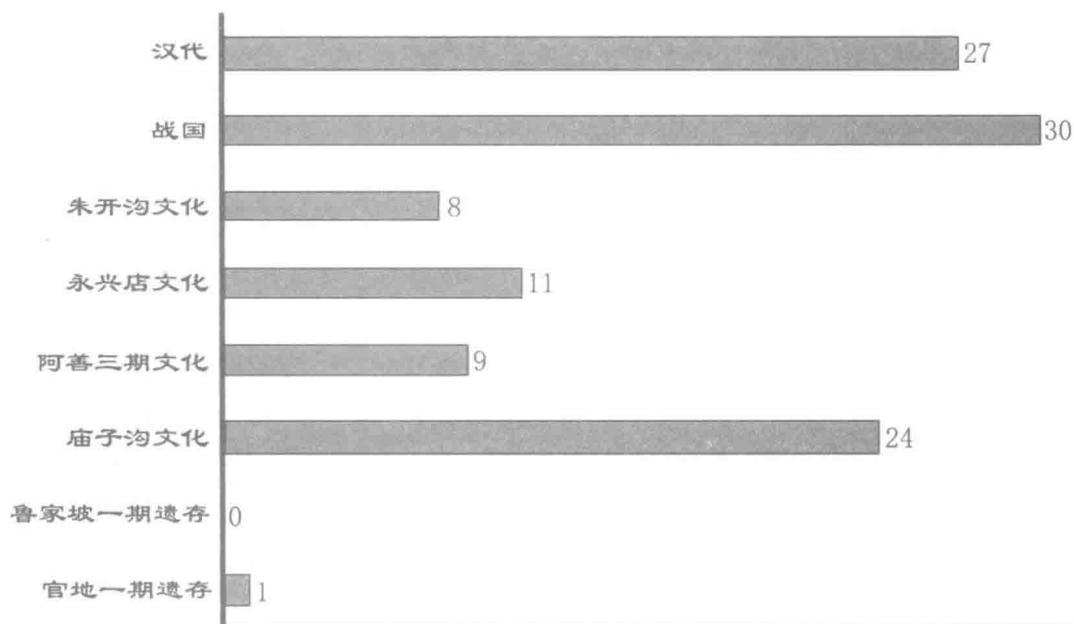
367处遗址中，单纯型遗址110处，复合型遗址257处（图一八五）。表明这一地区遗址点复合概率很高，较三分之二多的遗址都存在几种文化共同占据的情况。

110处单纯型遗址中，战国和汉代最多，分别占单纯型遗址总数的27.2%和24.5%；其次为庙子沟文化，占单纯型遗址总数的21.8%；阿善三期文化、永兴店文化和朱开沟文化数量相当，分别占单纯型遗址数量的11%、8.2%和7.3%（图一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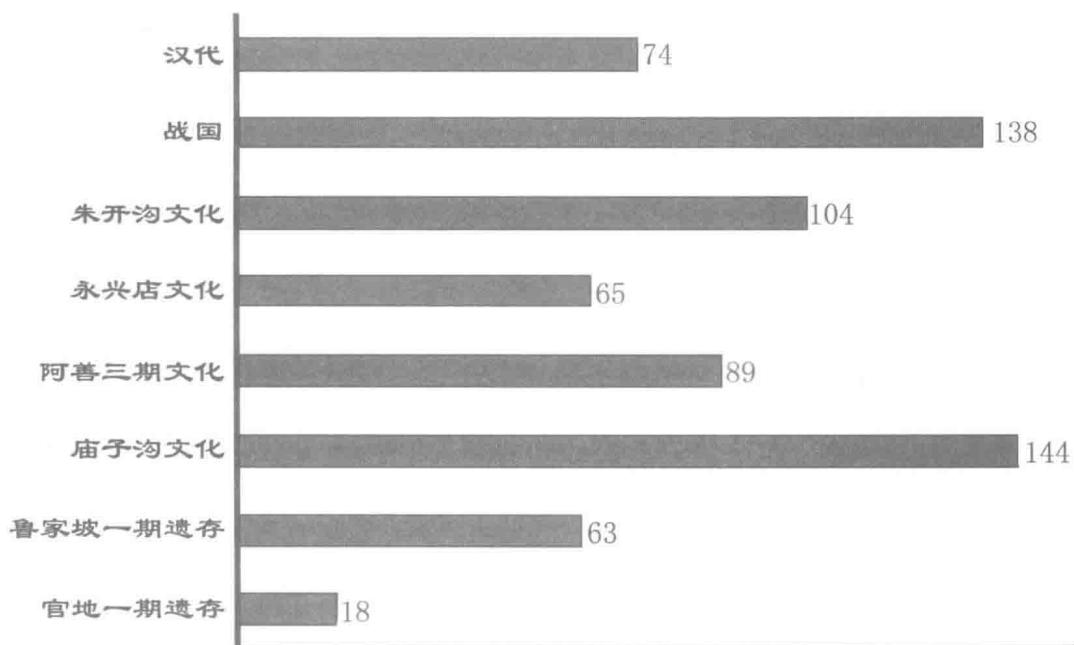
257处复合型遗址中（12处晚期辽、金时期遗址不作统计），庙子沟文化和战国居多，分别占复合型遗址总数的53.9%和52%；其次为朱开沟文化、阿善三期文化、汉代、永兴店文化和鲁家坡一期遗存，分别占复合型遗址总数的39%、33.3%、27.7%、24.3%和23.6%；官地一期遗存占复合型遗址总数的6.7%（图一八七）。

3. 复合型遗址复合的情况

复合型遗址257处，除去晚期复合型遗址12处，仅两种文化复合的117处、三种文化复合的76处、四种文化复合的30处、五种文化复合的20处、六种文化复合的1处，七种文化复合的1处（表一）。



图一八六 单纯型遗址数量分布图



图一八七 复合型遗址数量分布图

表一 仅两种文化复合遗址点数量列表

	官地一期遗存	鲁家坡一期遗存	庙子沟文化	阿善三期文化	永兴店文化	朱开沟文化	战国
鲁家坡一期遗存	1		6				
庙子沟文化		4	5				
阿善三期文化		3	8				
永兴店文化		1	22				
朱开沟文化		3	9	3	2		
战国	1	3	6	6	3	7	
汉代		2	5	5	6		17

两种文化复合的机率最高，在仅两种文化复合的117处遗址点中，其组合类型有20种，平均每一种组合类型约6处。而位居前三的组合为庙子沟+战国22处，战国+汉代17处，庙子沟+汉代9处和庙子沟+朱开沟8处（表二）。

表二 含两种文化复合的遗址点数量列表

	官地一期遗存	鲁家坡一期遗存	庙子沟文化	阿善三期文化	永兴店文化	朱开沟文化	战国
鲁家坡一期遗存	5						
庙子沟文化	7	36					
阿善三期文化	7	26	48				
永兴店文化	6	16	36	20			
朱开沟文化	7	36	68	45	27		
战国	10	28	7	41	33	52	
汉代	1	12	34	17	14	14	34

包含两种文化的复合型遗址中，庙子沟文化+朱开沟遗址数量最多，其次为朱开沟+战国52处，庙子沟文化和朱开沟文化的复合的最多，占据复合型遗址的26.5%，其次为庙子沟与战国的复合，占据复合型遗址的20.2%，表明庙子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和战国相互复合的机率较大，也表明三者之间选址条件相近。

三种文化复合的76处，这种组合的类型有32种，平均每一种类型约2.4处。而位居前三位的组合为庙子沟+朱开沟+战国9处，庙子沟+朱开沟+汉代7处，庙子沟+阿善三期+朱开沟6处。也表明庙子沟、朱开沟、战国和汉代复合率较高，且朱开沟和阿善三期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相似性。

四种文化复合的30处，这种组合的类型有19种，平均每一种类型约1.6处。四种文化复合最多的有鲁家坡一期+庙子沟+阿善三期+朱开沟4处，庙子沟+阿善三期+朱开沟+战国3处。

五种文化复合的20处，这种组合的类型有10种，平均每一种类型约2处。超过平均数的组合有鲁家坡一期+庙子沟+阿善三期+朱开沟+战国4处，鲁家坡一期+阿善三期+永兴店+朱开沟+战国3处。

六种文化和七种文化复合的皆1处。

从仅含两种文化和包含两种文化的遗址复合情况来看，庙子沟、朱开沟、战国、汉代复合机率较高，表明这几个阶段除了遗址数量较多的原因外，亦表明两者对遗址的选择具有相近的趋向。从三种以上文化的遗址复合情况来看，除了可进一步印证庙子沟、朱开沟、战国和汉代复合率高外，阿善三期与朱开沟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相近的选址条件。

4. 复合遗址反映的覆盖率

遗址的覆盖是指晚期文化对早期文化选址点不止一次的利用，理论而言，该遗址的文化属性越多，其遗址的利用率越高，也就是说因为遗址的选址条件很好，才会被多次使用。

从官地一期遗存来看，共19处遗址点，18处皆被晚期文化覆盖。所以说官地一期遗存被覆盖率为94.7%，废弃率仅为5.3%。

鲁家坡一期遗存遗址点63处，除5处覆盖了官地一期遗址点外，被晚期利用的遗址点58处，可见鲁家坡一期遗存的覆盖率为7.9%，被覆盖率为92.1%，废弃率为0。

庙子沟文化遗址点168处，复合型144处，39处覆盖了官地一期遗存或鲁家坡一期遗存的遗址点，可见庙子沟文化的覆盖率为23.2%，被晚期覆盖的遗址点105处，被覆盖率为62.5%，废弃率14.3%。

阿善三期文化遗址点98处，复合型89处，63处为覆盖前期文化遗存，覆盖率为64.2%，被晚期沿用的遗址点26处，被覆盖率为26.5%，废弃率为9.2%。

永兴店文化遗址点76处，复合型65处，49处为覆盖了前期文化遗存，覆盖率为64.5%，被晚期利用的遗址点16处，被覆盖率为21.1%，废弃率为14.5%。

朱开沟文化遗址点112处，复合型104处，96处为沿用前期文化遗存，覆盖率为85.7%，被晚期利用的遗址点8处，被覆盖率为7.6%，废弃率为7.1%。

战国遗址点168处，复合型138处，121处覆盖了前期文化遗存，覆盖率为72%，被汉代沿用的遗址点17处，被覆盖率为12.3%，废弃率为17.9%。

汉代遗址点101处，复合型74处，因为汉代以后的遗址点不作讨论，所以74处遗址点皆为沿用前期文化遗存遗址点，其覆盖率为73.2%，废弃率为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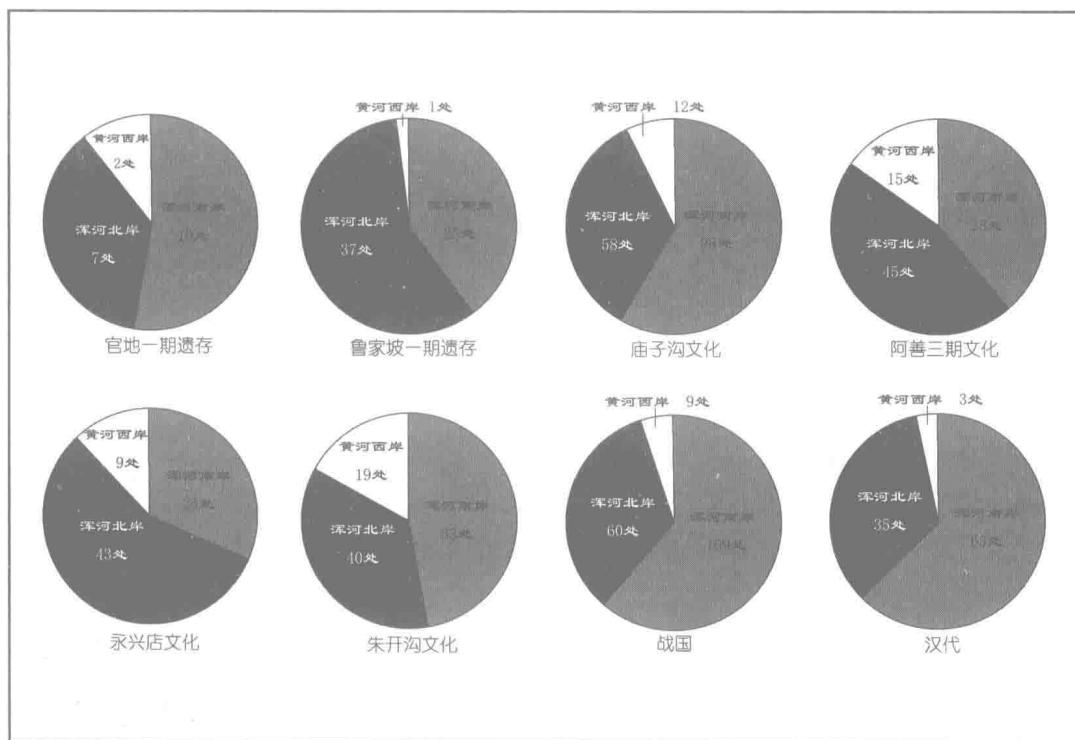
按照普遍规律来说，覆盖应呈递增趋势，即官地一期最早，没有覆盖其他的可能性，而越晚的覆盖前期的机率越高，被覆盖率应该是呈递减趋势，越早的被晚期覆盖的机率越高。然而事实是，朱开沟文化沿用前期文化遗存的遗址点机率最高，而被晚期覆盖的机率却也最低，从另一方面可能说明朱开沟文化选址的特殊性，即基本都沿用前期文化遗址点，而新开发的较少；而庙子沟文化覆盖前期机率较低的现象，可能与庙子沟文化遗址剧增，需要大量开发新的遗址有关。

二 遗址的空间分布及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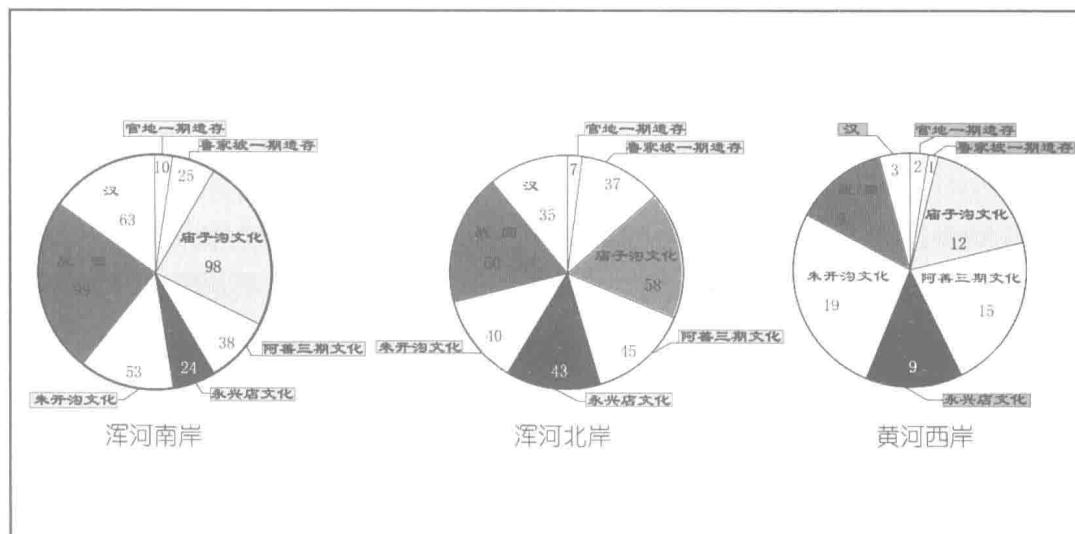
1. 不同地理区域的空间分布及变化

官地一期遗存共发现19处，其在浑河南岸、北岸以及黄河西岸所占比例相差不大，分布相当；鲁家坡一期遗存共63处，其在浑河北岸所占比重明显较大，而在黄河西岸明显较少，浑河南岸接近平均值；庙子沟文化共168处，浑河南岸略显多，但总体而言，其在三地的分布比重基本相当；阿善三期文化遗址点共98处，在浑河北岸和黄河西岸比重较大，尤以西岸为重；永兴店文化遗址点共76处，在浑河北岸和黄河西岸比重较大，南岸较少；朱开沟文化遗址点共112处，在浑河南岸和北岸的比重相当，而在黄河西岸明显较多；战国时期遗址点共168处，其在浑河南岸和北岸的比重基本相当，黄河西岸明显较少；汉代遗址点共101处，其在浑河南岸和北岸的比重基本相当，黄河西岸明显较少（图一八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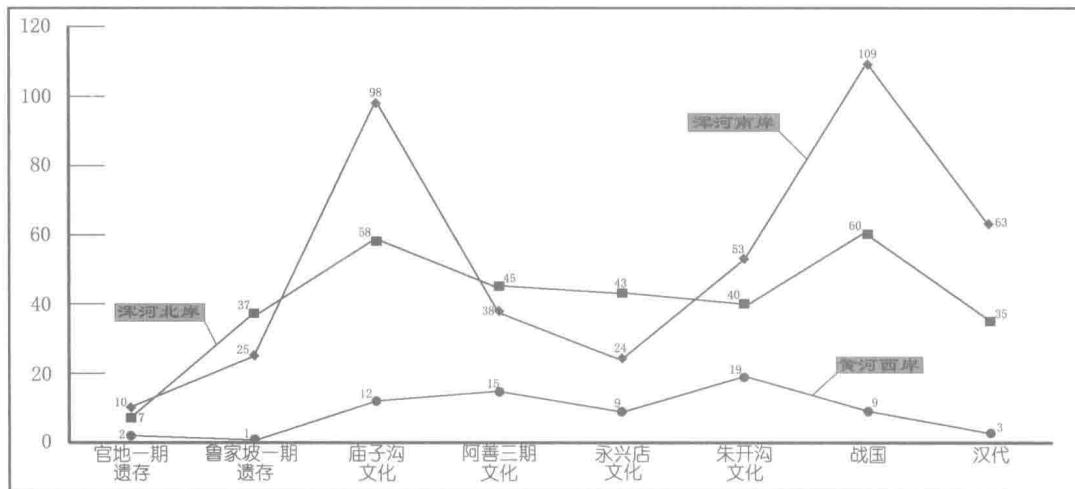
浑河南岸遗址数量200处，北岸遗址数量136处，黄河西岸遗址数量31处。同一区域内不同文化的分布变化从图一八九来看，浑河南岸战国和庙子沟文化数量最多且相当，分布密度高达49.5%和49%；其次为汉代和朱开沟文化，分别为31.5%和26.5%；然后是阿善三期文化、鲁家坡一期遗存和永兴店文化，分别为19%、12.5%和12%。浑河北岸战国和庙子沟文化数量最多且相当，分布密度高达44.1%和42.6%；其次为阿善三期文化、永兴店文化和朱开沟文化，分布密度达33.1%、



图一八八 各文化在不同区域内遗址数量分布变化图



图一八九 各区域内不同文化遗址数量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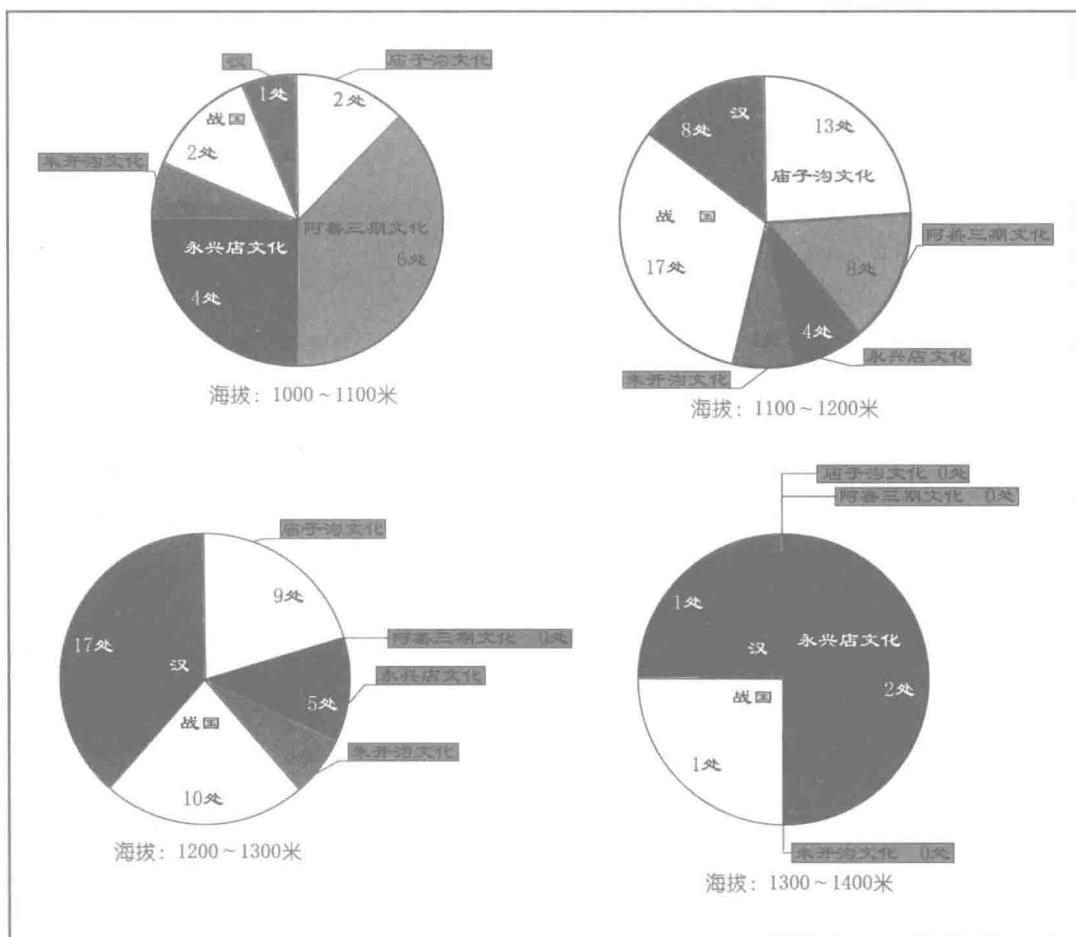
图一九〇 各区域内不同文化遗址数量变化趋势图

31.6%和29.4%；然后为鲁家坡一期遗存和汉代，分布密度达27.2%和25.7%。黄河西岸朱开沟文化和阿善三期文化相当，分布密高达61.2%和48.4%；其次为庙子沟文化、永兴店文化和战国，分布密度分别为38.7%、29%和29%（图一九〇）。

按照浑河南岸、浑河北岸和黄河西岸三地的分布密度和来看，官地一期在三地都处于低点，表明其遗址数量较少，人口稀少，可选择的居住地的余地较大。而鲁家坡一期、阿善三期和永兴店文化北岸比重较大，尤其是永兴店文化，表明北岸适于居住的避风向阳的坡地更多。阿善三期文化和永兴店文化在黄河西岸的分布比重较大，表明这一时期选址对靠近河流的要求较高。庙子沟文化在三个区域内基本都处于高点且较为平均，表明其为了扩大遗址点数量，对遗址点的选址条件限制较少。战国、汉代时期的遗址数量南岸较多，表明迫于居住压力的增加，一些选址条件不甚理想的地段也被建成新的聚落。而战国和汉代在黄河西岸较少，尤其汉代在黄河西岸特别是近黄河区域几乎不见，表明此时期遗址点选址已经远离河流两岸。朱开沟文化时期，南北两岸遗址平衡分布，而黄河西岸明显比重较大，可能与其选址条件特殊有关。

2. 不同海拔高度的分布及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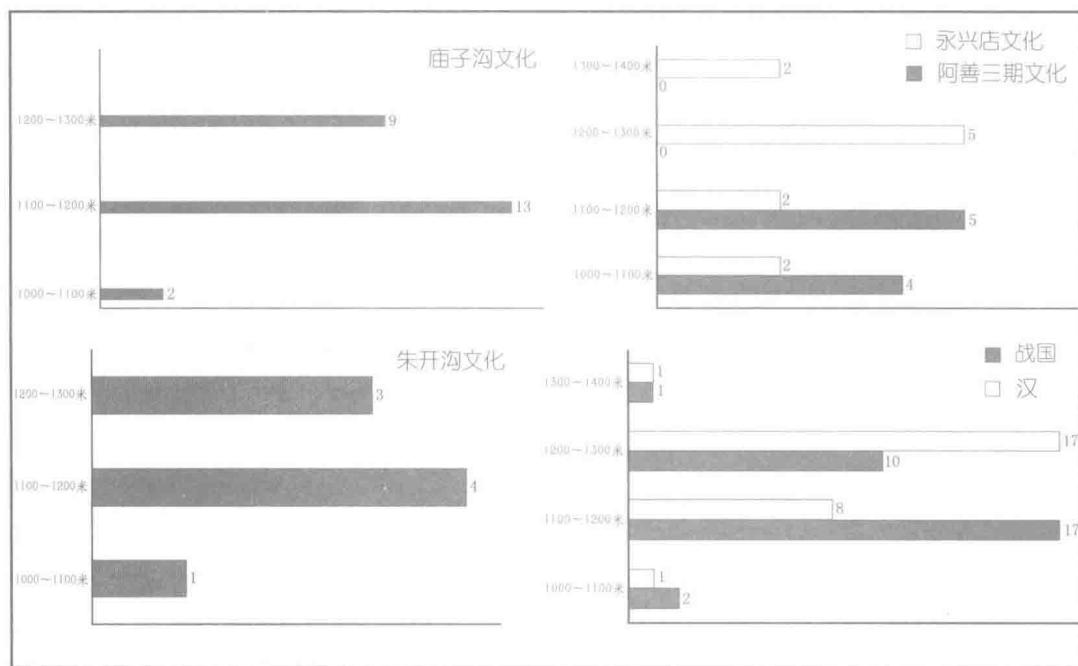
遗址海拔高度的分布情况是以单纯型遗址来进行探讨的，其中鲁家坡一期遗存没有单纯型遗址，官地一期遗存仅1处单纯型遗址，故对之不做探讨。经分析可知，海拔1000~1100米的16处遗址点，阿善三期文化和永兴店文化占62.5%，其余分布较少，表明这两种文化分布的海拔高度偏低。海拔1100~1200米的54处遗址点，战国和庙子沟文化占55.6%，其次为阿善三期文化和汉代，朱开沟文化和永兴店文化较少。在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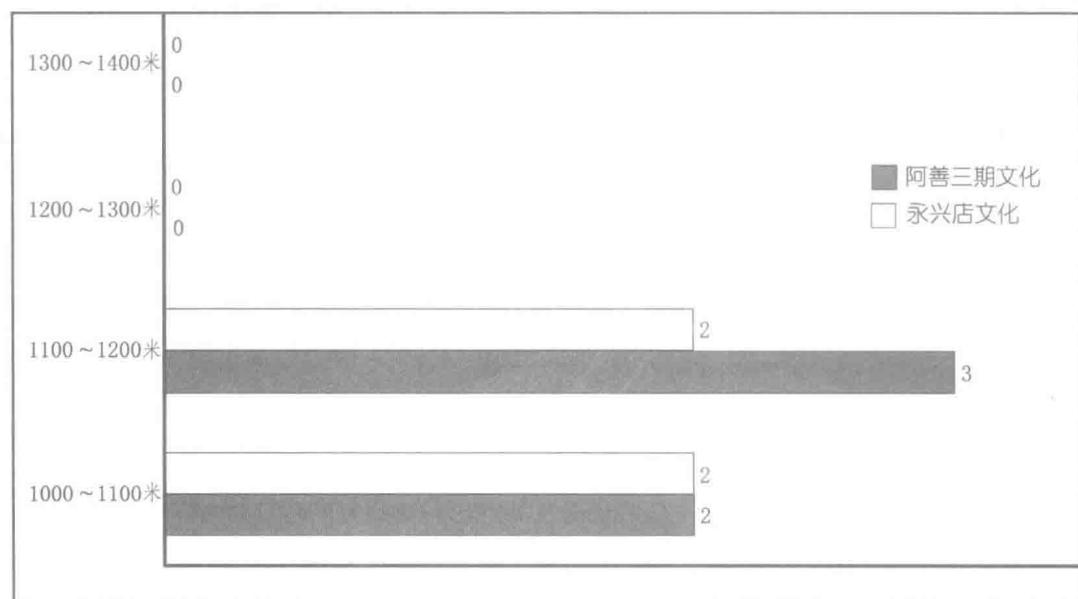
图一九一 不同海拔高度范围内各文化遗址数量分布图

拔1200~1300米，除汉代遗址点数量增加较多外，永兴店文化增加1处，其余几种文化都在减少，而阿善三期文化以致没有。表明汉代遗址开始选择较高的地势，而对于阿善三期文化而言，这一高度已经不适于居住了。在1300~1400米，遗址总数较少，仅4处，显然这里的环境已不适于人类居住（图一九一、一九二）。

庙子沟文化分布的海拔高度在1000~1300米，1300米以上不见。阿善三期文化分布在1000~1200米，1200米以上没有分布。永兴店文化分布范围较广，1000~1400米皆有，且在几个海拔范围内较为平均，1200~1300米较多。另外，阿善三期文化和永兴店文化还发现了部分石城，石城分布的海拔高度均偏低，阿善三期文化的单纯型遗址和石城皆分布在1200米以下。朱开沟文化分布在1000~1300米，主要分布在1100~1300米。战国和汉代分布范围皆较广，两者都集中分布在1100~1300米，战



图一九二 各文化在不同海拔高度内遗址数量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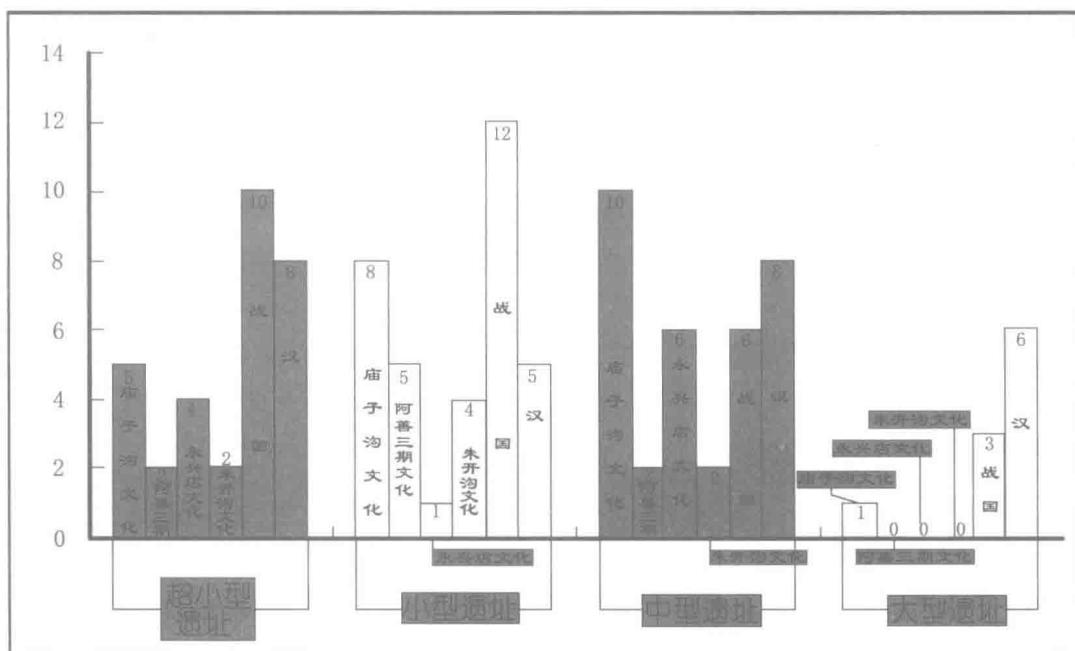
图一九三 石城海拔高度分布图

国分布的海拔高度偏低或偏高的较少，分布在1100~1200米的居多，而汉代分布在1200~1300米的居多（图一九三）。

总体而言，遗址点主要集中分布在海拔1100~1300米的范围之内，表明这一海拔高度最适宜人类居住。庙子沟文化和朱开沟文化海拔分布高度相近，皆在1000~1300米，且在每个海拔高度范围内分布趋势也相近，表明这两者的选址在海拔高度的选择上较为接近。阿善三期文化分布海拔高度都在1200米以下，普遍偏低，说明这一时期的聚落更为依赖水源。永兴店文化、战国和汉代分布范围较广，在1000~1400米皆有分布，战国和汉代偏高，尤其是汉代偏高的居多，说明聚落对水源的依赖性开始减弱，出现了远离水源的趋势，而到了汉代则明显远离河流。永兴店文化的海拔分布可能另有他因，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虑。

3. 遗址面积的分布及变化

各文化遗址面积问题的探讨，需要建立在对单纯型遗址数据统计的基础之上。故官地一期和鲁家坡一期不做讨论。根据统计需要，遗址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为超小型遗址，1万~3万平方米为小型遗址，3万~10万平方米为中型遗址和10万平方米以上为大型遗址（图一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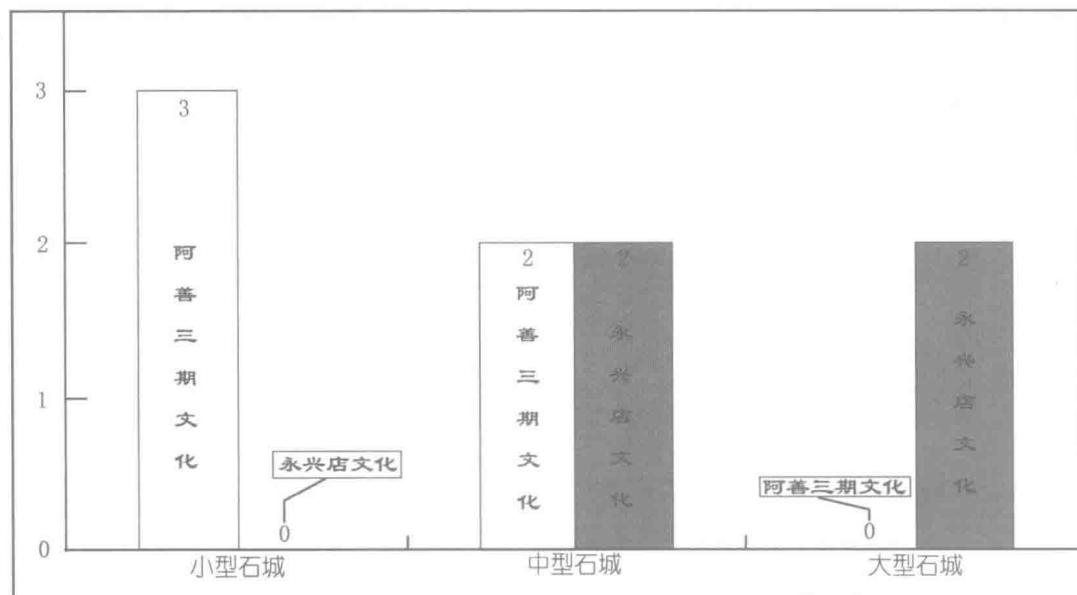
图一九四 各文化遗址规模数量分布图

官地一期最大的一处单纯型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庙子沟文化单个遗址面积最大可达10万平方米以上，但基本皆为中小型，小型和超小型的遗址约占庙子沟文化单纯型遗址的54.2%，中型占41.7%。阿善三期文化时期聚落面积较小，大型聚落不见，集中在中小型，尤其是小型居多。小型和超小型的遗址占据了阿善三期文化单纯型遗址的77.8%。但是这时出现了不同于一般遗址的石城，石城面积较一般遗址面积大，至少在阿善三期文化的单纯型遗址中，最小的石城也与中型遗址相当，中型石城可达10万平方米以上（图一九五）。永兴店文化与阿善三期文化相近，大型聚落不见，集中在中小型，但以中型居多。这一时期明显区别于一般遗址的石城显得尤为突出，石城面积均较阿善三期文化的大，最大的可达138万平方米。朱开沟文化不见大型遗址，皆为中小型，以小型和超小型居多。战国时期，大型遗址虽然不多，但聚落面积增加，10万平方米以上的较多，最大的一处单纯型战国聚落面积达48万平方米，另外还有一部分复合型遗址中面积达10万~30万平方米的，也基本为战国遗存分布，而发现的一座战国城址面积竟达40万平方米。总体而言，战国遗址中超小型和小型遗址居多，占64.5%。汉代遗址，小、中、大型分布相当，复合型遗址中有一处达60万平方米的，汉代遗存全面分布（彩版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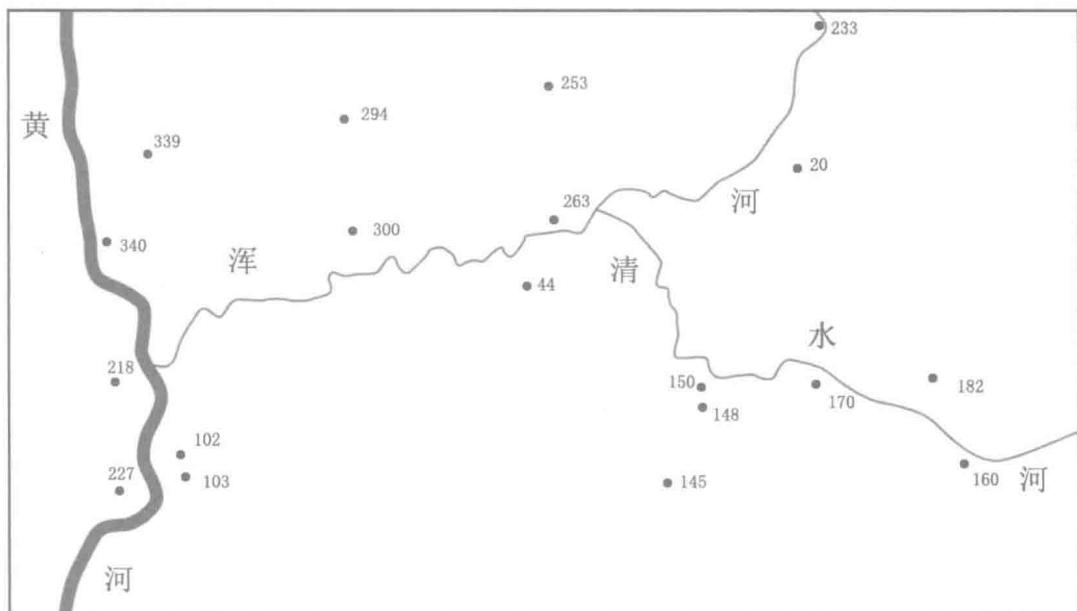
整体而言，各文化的单个遗址面积从早到晚是呈扩大趋势。

4. 同一时期遗址的组合关系及聚落形态

官地一期遗存遗址19处，均集中在河流和沟谷两岸的较高的台地之上，除少量遗



图一九五 石城面积数量分布图



图一九六 官地一期遗存遗址分布图

址外，各遗址几乎呈等距离分布（图一九六；彩版三；彩版四一）。

鲁家坡一期遗存数量明显增加，共63处。遗址主要还是分布在沿河较近的台地之上，尤其集中在浑河北岸河流每一个小拐弯处的台地之上。其中浑河北岸18处、浑河南岸11处，黄河西岸7处，清水河两岸8处，仅河流两岸的遗址就占据69.8%。遗址间的距离较前期明显缩小，多为两三处遗址成组出现（图一九七；彩版四；彩版四二）。

庙子沟文化遗址急剧增加，遗址还是在河流两岸分布较为集中，黄河西岸30处，浑河两岸54处，清水河两岸41处。仅河流两岸的遗址点就占据74.4%。遗址分布极为密集，难以观察到成组分布的态势（图一九八；彩版五；彩版四三）。

阿善三期文化遗址点数量减少，黄河西岸28处、浑河两岸34处、清水河两岸9处，河流两岸遗址点占据了62.2%。遗址点除了集中在河流两岸之外，远离河流的遗址点显得较为分散，遗址多呈三三两两分布。此阶段在河流两岸出现了不同于一般聚落注重防御的石城，石城选址地点特殊，地理优势明显，即皆为紧邻河流的高地之上，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多单个出现，未普遍出现多个遗址成组分布的情况，由于其面积比普通遗址大，有的面积可达20万平方公里，故其可能已脱离一般遗址成为中心聚落。此外，225号石城，处于黄河西岸拐弯处的一个圆形山顶之上，两道石墙围绕椭圆形的山体修成同心椭圆形，面积为7.5平方米，遗址中心现存有大型建筑台基。该石城的地理环境不适于人类居住，可能是当时的祭祀中心（图